

人文
学术

张 辉 宋炳辉 主编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

张 华 著

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诠释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Intercultural Annotation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

张 华 著

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诠释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Intercultural Annotatio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诠释/张华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9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张辉,宋炳辉主编)
ISBN 978-7-309-09848-8

I. 跨… II. 张… III.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 IV. I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1964 号

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诠释

张 华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217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848-8/I·772

定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学术顾问：乐黛云 杨慧林 谢天振

陈思和 陈跃红

主 编：张 辉 宋炳辉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总序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第一辑即将与读者见面。从动议编辑这套文库到今天,转眼已三年。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中生代”比较文学学人一次小小的集结;“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是我们献给自己师长们一份迟交的作业;“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这又是我们给各位同仁乃至更年轻同行们发出的对话与批评的邀请。

三年的酝酿筹划、三年的协同努力,使我们逐步将自己的工作与更深远而广大的时间和空间背景联系了起来,并开始慢慢融入其中。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一代”比较文学学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每一点成长与进步,都受惠于祖国的改革开放,受惠于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受惠于同辈间的切磋琢磨。我们是这十五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段文化积淀的受益者,也是一批如饥似渴的学习者和无比幸运的历史见证者。我们也许注定是行色匆匆的“过客”,但我们却也应是承先启后的“桥梁”,必须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这里记录的正是我们探索行进的脚步,也是我们所从事的学科一点微末的贡献。

百年中国文学“走向(进)世界”的历程,给了我们思考过去、筹划未来的“底气”;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与发展,为我们准备了难能可贵的学术资源和不可或缺的学科建制。我们将这套丛书命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术文库”,以之与我们所属的学科名称相呼应,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默契:打破界限、超越语言与文化的限制,乃是我们比较文学学人的使命乃至宿命。是的,我们无疑拥有不同的学术爱好、志趣和观点,但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把我们联系在

了一起——那就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语境中,以比较的眼光,从多学科对视阈,面对并尝试回答我们所浸润其中的文学与文化问题。

“道不孤,必有邻。”非常幸运的是,我们身处富于活力和学术追求的知识与精神共同体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许多老师和朋友的无私帮助,也得到了具有远见卓识的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以及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这里,要送上我们衷心的感谢。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与这套“文库”相呼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辑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讲座系列”等姊妹项目也已陆续启动。

在“文库”第一辑即将面世的这个特殊时刻,先贤们的声音似乎又一次在我们的耳畔响起。鲁迅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应“内之弗失既有之血脉,外之仍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陈寅恪先生则说,华夏文化的崛起须“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出,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响应先贤的号召,集结这八本著作,仅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这“取今复古”、“扩大恢张”的行列中,贡献他们的智慧与力量;希望以后各辑不久将与读者见面。

是所望也,谨为序。

编 者

2013年5月

目 录

第一编 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文学、 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

生态批评的现代性背景及其当代发展逻辑	3
生态批评当代传播的始点与路向	13
作为文化与社会批评的生态批评	22
生态美学的当代建构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25
文化生态、心理生态和想象	53
生态美学：注重人与自然整体和谐	
——访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张华博士	72

第二编 文学与社会学：走向 文化研究的文学理论

伯明翰文化学派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影响	83
伯明翰学派何去何从？	
——对伯明翰学派嫡系传人 Gargi Bhattacharyya 博士的访谈	94
艺术教育模式中的文化学派影响	103

中国鬼神文化与高罗佩	108
中国古琴文化与高罗佩	121
中华民族大文学史观和世界文学	135

第三编 文学与宗教学：宗教 对话与文化互释

神学基本问题的重构性诠释	153
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	165
儒家思想当中的超越观	177
圣经文学的奇幻版本	
——解读 C·S·路易斯《纳尼亚传奇》	187
梅·萨藤的文学创作对原始神话的女性诠释与重构	206
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模式	216
圣像崇拜与圣言隐遁	224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杜维明访谈	233

第一编

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文学、 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

- 生态批评的现代性背景及其当代发展逻辑
- 生态批评当代传播的始点与路向
- 作为文化与社会批评的生态批评
- 生态美学的当代建构及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 文化生态、心理生态和想象
- 生态美学：注重人与自然整体和谐

生态批评的现代性背景及其当代发展逻辑

20 世纪曾经产生过许多文学批评流派,生态批评是其中之一。然而,生态批评的产生与许多只着眼于文学“内部研究”的其他流派不同。它产生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生态危机的现实压力和迫切需要,来自愈演愈烈的、危及整个自然(包括人类在内)之存在的生态灾难;另一方面,还来自人类更为深层的内在需要,来自改变对待自然、对待世界的价值取向和伦理态度的需要。在这两种动力之下,20 世纪末生态批评得以在美国产生并迅速发展。随后,生态批评的当代发展出现了多元局面,比如,有人将它当作对描写自然的作品批评而予以建构,有人把它看成关注自然、揭示具体的环境问题的批评而加以发展,有人则仅仅视之为探讨文学与环境之关系的批评并予以强调,有人把它局限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围内,还有人把生态批评称作环境文学批评,等等,但是,在生态批评多种多样的发展走向中,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的内涵与走向始终是其前进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充分表明了生态批评从产生之日起发展到今天的内在逻辑性。



现代人类所遭遇的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的严重程度已是有目共睹的事,这是生态批评产生的现实背景,它给人以警示的同时也唤醒了人的环境意识和生态意识,促使人们行动起来加以治理。然而,对生态危机的疗救仅仅止于实践层面显然不能解决根本问

题,因为,人类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进程,甚至直接改变着人和他周围的世界的进程。地球生态环境所出现的当代危机,无可否认地与人的哲学观念和思想意识相关联。因此,深度了解危机的根源并进而加以疗救,必须从观念和思维方式上加以检修、改造甚至重建,这是当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生态批评理应担当的责任。

在广泛而深刻地检视人类文明进程中出现的观念性问题时,“现代性”概念无疑是思想学术界高度重视的关键词,而反思现代性的第一步必然是追问其实质,探讨现代性概念指涉的社会实存要素及其实质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因为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决定对现代性危机根源的诊断以及相应解决方案的产生。

自解构主义到利奥塔德(Jean-Francois Lyotard)的法语学界,从文本分析角度把现代性看做是一种宏大叙事,而德语思想界则素有将人类生活明确区分为精神、文化领域与社会生产实践领域的传统,因而从有着社会学之父盛誉的韦伯(Max Weber)开始就通过将“现代性”(Modernity)一词放在与之密切相关的另外几个同根词——“现代”(Modern Age)、“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起加以比较甄别来确定现代性的特殊性质。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结构特质的生成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依据他的观点,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所谓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而“现代性”则是“合理性”。但是,韦伯又将合理性区分为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实质合理性)等类型。工具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而价值合理性则以信念、理想、主观价值为目的,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在韦伯看来,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前者,即工具合理性。根据韦伯的分析范式,从工具合理性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和独立的个体……,是具有高度合理性的。这种区分经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现代性问题专家的发展和阐释,已经形成一种较为通行的观点:

“现代化”一词主要是一个社会学术语,指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世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体系;“现代主义”则由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个特定的文学艺术流派扩大为泛指所有精神文化生产领域;而“现代性”则更多地用来指称社会现代化和文化现代主义背后所共有的哲学或形而上学基本理念,是一种精神的或意识形态的力量^①。因而,在更多时候人们倾向于在一种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以之涵盖“现代化”和“现代主义”,把这两者视为“现代性”精神在不同领域的不同表现方式。

“现代性”无疑与时间意义上的“现代”密切相关。但是,由于时间性的“现代”是一个恒久地发生着的事情,每个历史时代相对于该时代的人来说都是“现代”,如果仅仅从时间维度去把握现代性概念,就失去了它的特定内涵。因此,探问现代性的特定内涵——现代社会的性质,才是更具有意义的问题。关于现代性的起始时间,学术界众说不一,神学思想家丢普瑞(Louis Dupre)认为现代性精神萌生于中世纪晚期的 14 世纪末,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现代性的社会生活组织模式出现于 17 世纪,而真正广泛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则是哈贝马斯等人以启蒙运动时期作为现代性精神真正确立的时代的主张^②。由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表述:现代性概念有其特定的指涉范围,表征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社会整体结构的特征和性质。社会整体结构可以从各种方面进行考察和描述,但从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文化心理两个方面。相应的,现代性概念也就具有双重意蕴,即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在现当代文献中,前

① John Thornhill, *Modernity: Christianity's Estranged Child Reconstructed*,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chap.1.

② Louis Dupre, *Passage to Modernity: An Essay in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e and Cul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1995.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welve Lectures*, tran.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者被称为启蒙现代性、理性主义的现代性；而后者则被冠以浪漫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等名称。后者常常以文学艺术批评的形式对前者形成某种程度的制衡，使整个社会在这种张力中向前发展^①。

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的本质内涵呢？在我看来，现代性精神的最基础、最核心、也是最广为接受的内涵应该是人的主体性。所谓人的主体性，在现代性语境中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它标志着现代性是一种相对于前现代的中世纪那种以上帝为中心的意识形态模式相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具有天赋理性能力的人代替上帝成为思想的起点、世界历史的中心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其次，这里的“人”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个体存在，而是笛卡儿式的以精神和思想为本质特征、作为世界主体的抽象的人的概念，是一种“精神性自我”，即主体的人。这种“精神性自我”和主体的人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它的根本规定性即是启蒙主义者极力推崇、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的理性。这样，以理性为基本素质的精神性主体对于自我作为世界历史主宰者的身份的充分自觉和自信就构成了现代性精神的核心内涵，其他有关现代性的界定种种，如进化论的历史观、非历史主义的真理观、追求同一性和确定性的思想方法、科学理性或称工具理性的胜利，甚至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则莫不渊源于此。所以，就西方来说，现代性指“在启蒙运动中被建立起来的现代时期的中心特征”，与“纯粹理性至上和现代自我的自主决断相联系。现代人以理性为武器，寻求一种基于统一形而上学架构的普遍观点来看待世界。他们寻求他们自己的主体性自律，并拒绝历史传统和文化的钳制”^②。

① 关于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关系，参见拙著：《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上篇第一章第二节，中华书局，2006年。

② 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30页。

二

然而,“现代性”是以“现代性问题”的面貌而吸引思想学术界的全力关注的。现代性之所以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关键词,就在于它是一个问题丛生的领域。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把启蒙运动作为现代性的开端,从那时起西方文明在现代性的道路上已经奔跑了两个多世纪,人们曾经深信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可以一直奔向理想的、终极的、永恒自由的王国。然而,近一个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却发现这条道路远非想象中那样平坦笔直,文明脚步已经屡屡被它束缚和困绊。而后现代,正是对它的深度反思和反省,是对它的检视和检修。在当代西方思想家中,很少有人能够完全不参与到反思、检视和检修现代性的工程当中,因为,现代性精神是一把双刃剑,在成就西方现代文明辉煌成就的同时,它的过度膨胀也是造成当前各种危机的最直接思想根源。工具理性的发展,使人类在有效地改造自然、建构社会制度等方面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是,工具理性的扩张,无疑也是生态环境破坏、人际关系冷漠、人的片面发展以及各种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舍勒(Max Scheler)曾尖锐地指出,在现代性社会中,世界不再是精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①;韦伯则慨叹:“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②可见,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的扩张破坏了审美现代性与其共同形成的张力平衡,使社会出现了畸形的、危机四伏的发展态势,而生态危机就是其中之一。

① 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0 页。

②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 年。

一般认为,真正对现代性信心产生怀疑,并真正自觉、全面地展开检修现代性工程,应该是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一方面,尼采从哲学层面反思现代性问题,得出了“上帝死了”这样振聋发聩的结论,率先揭露出现代性精神以人的主体性摧毁一切传统权威、导致现代人价值无序的状况;另一方面,马克思、西美尔(Georg Simmel)、韦伯和托克维勒(Alexis de Tocqueville)等思想家主要从社会学角度解析现代性,深刻地揭露了启蒙主义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带来的人性的异化和社会制度的僵化。然而,人们真正普遍而深刻地感受到现代性问题的严峻程度,以至于不得不用“危机”一词概括之是在 20 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前后。奠基于启蒙时代的文明在残酷的现实中“跌倒”,摔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启蒙主义者所鼓吹的“永恒的理性王国”以及随后两个世纪中的一切具有相同的宏大叙事性质的乌托邦幻想在血的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主宰着整个宇宙的黑格尔式的无所不能的精神性主体如今在价值真空中颤抖,充满了对道德沦丧与精神虚无的恐惧;历史进步论也在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的逼迫下遭到了全面的怀疑。这时,在整个现代性矛盾分裂或张力结构中的审美现代性呈现出与理性主义和资产阶级庸俗生活观念的对立,它起因于美学家和诗人对现代文化中感性缺席的危机感和对人的感性生存的本体论忧虑,因此竭力追求感性生命和诗意的生存方式,同时排斥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对人的生存的内在意义。刘晓枫评论说,现代性“审美精神是一种生存论和世界观类型,它体现为对某种无条件的绝对感性的追寻和对诗意化生存秩序的肯定”^①。在这样一种西方现代性思想的阐释框架中,审美范畴的核心意义不再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而是感性反抗理性、拒斥理性、超越理性,感性在这里具有更为个体化、非理性化和生存论的意义。也正是在这样的现代性长期延伸的背景之下,具有审美特质的生态批评以一种文学批评

^① 刘小枫主编:《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经典美学文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年,第 1—2 页。

的姿态应运而生了,这种批评既针对工具理性极度扩张造成的外在形态的危机,又针对同样是工具理性极度扩张造成的内在形态的失衡。因此,从本质上讲,从一开始生态批评就具备文化批评、社会批评和政治批评的素质与内容。

三

生态批评产生时期,传统的文学理论虽已从对文本内在语言结构的精细分析中抬起头来,开始关注世界,但基本上将“世界”同义为社会,而世界应该是包括自然的世界,且艺术本该是和自然、生命亲善的。文学批评发展到今天,既可以对文本作“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检视,也能够结合其社会历史语境进行文学的“外部研究”,而且随着女性主义批评和后殖民批评的兴起,批评家越发意识到自己有权利也有义务以自己的工作为人类和社会负责。虽然生态批评自诞生时起便遭到不少非议,但由于其对女性主义、后殖民等政治性批评的传承,也由于环境恶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等现实压力,这股新兴的批评潮流已越来越显示出它旺盛的生命力。批评家在对文学外的种族、阶级、性别问题做出了关怀后,又把目光放到了处于边缘之边缘的自然上。生态批评是严肃的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彻底打开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文学批评的视阈经女权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已经与文本以外的性别、生产、经济、阶级、社会相融合,现在又向自然环境敞开了。它标志着文学研究已不仅穿越了其他的人文学科,也跨向了自然学科和自然本身,它在学术的前沿展示了文学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与外界不断对话的体系。

其实,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相关的人文学科都在“变绿”。有史学家提出自然不仅是人类社会这出史剧的舞台,它本身也参与了演出;人类学关注文化与地理的关系,重视考察生态环境对民族形成的关键作用;在心理学领域,有学者认为人与自然的疏远成为社